

# 余英時印象

作者：王汎森

**作者簡介：**王汎森為普林斯頓大學博士，任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專長為明清及近代之思想史、學術史、文化史。200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，2005年獲頒選為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。

十 六、七年前，當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時，注意到余先生早期在香港報刊雜誌上發表過許多文章，我便開始零星的蒐集這方面的文字，並準備寫一篇長文（甚至是一本小書）來加以討論。而且我的討論將盡量不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學術論著——我的意思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早已為人們所熟知，不必再經過我的重述——可惜因為個人疏懶，這個願望遲遲未能實現。最近承《數理人文》出題讓我寫一篇「余英時印象」，因為時間比較倉促，我只先選擇一些生活上的印象下筆。

我是在1980年，《中國時報》在宜蘭棲蘭山莊舉辦的一個閉門討論會上初識余先生的。如今回想起來，當時所有參與者，後來幾乎全部成為中研院院士或是內閣部會首長。我記得當時偶然有機會向余先生請教我的碩士論文《章太炎的思想》，曾提到當時大陸正在出版的《章太炎全集》動作太慢，深怕資料不足。余先生說史料不必勉強求全，但論旨要集中（原話是要有 focus）。還記得當時余先生棋興大發，與胡佛先生等人對奕，在座者都不是他的對手。由於我在一旁觀戰，余先生還轉過頭來問我：「你下圍棋嗎？」後來我才知道余先生業餘六段，得過新英格蘭地區本因坊，甚至還參加過在紐約的世界圍棋大賽。據我觀察，余先生似乎在學習與上手之間，時間距離特別短，學詩、學戲、學

棋、學書都是如此。這當然也讓我想起1980年代後期，我還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時，余先生有一度前往紐約與林海峰對弈的往事。

1985年，我從士官學校退伍，準備申請中研院工作。當時思想史在臺灣學術界如日中天，史語所願意招攬思想史方面的新人，而我也極其幸運的以碩士身分進入這個傅斯年口中的「天下第一所」擔任助理研究員。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的審查者之一，竟是余先生。

我真正有機會近身接觸、觀察余先生是在1987年到普林斯頓讀書之後。可惜在普大的五年中，因為課程太緊張，學期報告太多，每天「夾著尾巴」央求人改英文，居然沒有記日記，連僅有的三冊上課筆記也淪陷在我的書海中，一時無從翻檢。現在回憶舊事，腦袋一片空白，翻來覆去就是那幾件事。胡適說得好，人的記憶倏忽而逝，如果沒有一片紙記下來，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（所以胡適記了幾十年的日記，留下了一部寶貴的史料）。無論如何在那五年半間，我注意到余先生治學的幾個側面。

首先，余先生是隨時在打腹稿的人，他仔細審度每一個問題，而且異常的專注。我也注意到余先生

攝於唐獎系列座談「與漢學大師對談」，背影為本文作者。2014年。（唐獎教育基金會提供）





作者與余英時教授合攝於普林斯頓，1991年。（作者提供）

讀書，似乎字字是立體的，讀一句有一句之用，讀一段有一段之用，它們牢牢的留在心印之中，故他「引物連類」的功夫特別強。多年前中研院有一位同事寫了一篇與錢謙益有關的研究，余先生匆匆一閱，便馬上說它與陳寅恪《柳如是別傳》中的一個片段相出入。我個人對《柳如是別傳》並不陌生，但因為《柳如是別傳》的敘述濃厚、每每還有一點枝蔓，所以完全沒有把兩者想在一起，這是一例。

去年我偶然從史語所的「杭立武檔案」中見到1949年冬，有封向教育部長杭立武報告的信。信中報告說黃霖生已經到廣州勸陳寅恪一家來臺。寫信的章丙炎說黃霖生已經見過陳寅恪，但陳寅恪「因在鐵幕內受片面宣傳影響，對赴台深躊躇」。我偶然向余先生提及這封信，余先生馬上說陸鍵東《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》中有一段可以與這封信比觀。去年我受人之託，傳真了一篇《祖國周刊》的文章（凌空，〈介紹反共文化運動中的兩個學派〉），請余先生確認是不是出自他的手筆。不意余先生很快就回了一封傳真，推測作者應該是某某人，而這位先生曾經訪問哈佛，作過楊聯陞先生座上客，後來未再見過等，把握精確，決不含糊。

余先生的工作習慣是徹夜不寐的，所以我剛到普大時有幾次早上十點上課，覺得他臉色灰黃，有點站立不住的感覺。我也曾針對這一點請教余先生，

他的答覆是：人是身體的主人，身體聽我們指揮。意思是這不算什麼。而余先生當時煙癮正大，在普林斯頓大學時便聽說過余先生半夜找不到香菸，駕車到普大附近的連鎖便利商店 WaWa 買菸的故事。此外，我記憶最深的是余先生的長夜之談。余先生熬夜長談的本領真高，在節日前後，他每每邀請學生與訪問學者到家裡吃飯，並作長夜之談。這類長談往往持續到凌晨三、四點，當坐客皆已東倒西歪之際，余先生仍然從容的吸著煙斗或紙煙。

在我中學生的時代，臺灣正流行一種做卡片的運動。如果我的記憶沒錯，當時的名稱是「中央卡系」，我也曾受這波宣傳的影響，以為「卡系」是一點就通的治學利器。而且一般從事歷史研究的人為了輔助記憶力之不足，往往也比較系統的做卡片。我就認得一位傑出的經濟史家，如果忘了帶他的制式卡片，是不進善本書庫讀書的。因此，我曾好奇的問過余先生是不是做卡片。他說，除了早年為《後漢書》做過一整套卡片外，基本上是只記筆記，不作卡片。而且如果我的觀察沒錯，余先生讀書也不太劃線，與毛澤東「不動筆不看書」至為不同。甚至上討論課時，也不大筆記學生報告的重點。好似他的腦袋中有那麼幾個匣子，有意義的材料會自動存在裡面，等他開口評論時，只要依次打開那幾個匣子就行了。

余先生撰寫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期間，我曾一度



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上下冊，允晨文化，2003。



回母校，為了旅途解悶，余先生曾將一、兩章稿子交我閱讀。這時我注意到文稿中夾了幾張廢紙，上面零星的記著幾個詞或引文，我猜那便是他撰寫時所依靠的線索。至於余先生撰寫短文時，似乎是沈心研玩某些書之後，在腦海中形成幾條主要線索，然後將書合起來，繞著那三、四條線索，一氣寫成。在寫作的過程中，大概只有必要時才會回去翻檢原書。其情其景，可能是像晚明清初思想家陳確（乾初），陳說自己詳思多少年之後，決定判《大學》為偽經，乃下筆「快寫一過」。或是像陽明在頓悟良知之後，憑著對經書的記憶，快寫而成《五經臆說》。至少這是我讀余先生許多短篇文的印象。

余先生撰寫研究論文時，顯示一種海明威「冰山一角」式的表達方法，也就是說他並不像清代考據學者動輒擺出「證佐千百條」，他只擺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，所以需要佐證時，往往是一、兩條，或兩、三條，其他證據則留在海平面以下。因此，余先生的學術論文讀起來一氣呵成，沒有冗贅之病。而我之所以特別提到這一點，是因為近來由於電子文獻資料庫的發達，往往一按鍵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史料，如果不能割捨，容易出現過度水腫的情形，失去了閱讀時的暢快感。

余先生閱讀的方面非常廣，如蜜蜂採花釀蜜，但大多備而不用。等到要寫某一篇文章時，各種資源自然群到筆下，這也還是「冰山一角」式的作法。依我學生時代的觀察，他對當代正在發展的人文要籍也非常注意。這中間包括像伯林（Isaiah



2010年作者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F.Mote Memorial Lecture時，與余英時教授、W.Peterson教授合影。  
（作者提供）

Berlin）、泰勒（Charles Taylor）、羅蒂（Richard Rorty）、哈伯瑪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、呂克爾（Paul Ricœur）等人的書。那些年代余先生飛行機會比較多，坐飛機正是他讀書的時候，我記得羅蒂的《偶然、反諷與團結》（*Contingency, Irony, and Solidarity*）一書就是他在從臺北飛到紐約時讀完的。這樣的例子，不勝枚舉。我手上還留著一張紙條，是余先生託我到普大火石（Firestone）總館幫他借《重訪到奴役之路》（*The Road to Serfdom, Revisited*）。

余先生極少託我們這些研究生做事，他是所謂的「單幹戶」。從作研究到寫文章，全部一手包辦，純粹農業時代的手工作風，頂多請系秘書幫忙繕打英文稿，但余先生的英文稿是清澈而謹慎的。最近我有機會讀到他的一篇英文稿，特地影印了一份，好警醒自己不要滿紙鬼畫符。

余先生是不碰電腦的。記得他在2006年獲得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「克魯格獎」（Kluge Prize）時，我正好遇到翁啟惠院長，提醒他因為余先生



余英時教授接受訪問。2014年。（唐獎教育基金會提供）

是中央研究院院士，所以應該送一封賀函。過了幾天，再度遇到翁院長，我問他送了嗎？他說送了。我問用什麼方式，他說電郵。我急呼：「余先生沒有電腦，也不收電郵，您的郵件送到哪裡去了？」至今，這還是個謎。

余先生 1955 年離開香港到哈佛，他是帶了許多當時華人學界的關懷與困惑前往的，故他到哈佛之後便關心希臘時代、文藝復興、人文主義等主題。此外，關心余先生早年寫作的人，已經注意到余先生在香港時期的少作，都肯定自由、民主、人權等普世價值，而且文章最常出現的詞彙是「思想」、「文明」。但在香港時，他的研究是以社會史為主，即使在美國擔任教職初期，仍是以廣義的社會經濟史為主，後來才逐漸轉向思想史。所以我推測余先生早期有一個思想與學術複調平行的發展，後來逐漸歸於思想、文化一路。

在 2007 年一篇題為

〈歷史女神的新文化轉向及重新發現亞洲的傳統〉 (Clio'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) 的文章<sup>1</sup>，我注意到它似乎是余先生的夫子自道。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：余先生身處的時代學術環境中馬克思主義歷史命定主義影響甚大，認為文化、意識是被社會經濟所決定，歷史是被定律所支配。余先生此後的發展似乎對這類帶有決定論色彩，或認為歷史有通則的思想進行徹底的反思，強調文化及意義的自主性，同時也強調傳統。他說在 1955 年，第一次讀柯靈烏 (R. G. Collingwood) 的《歷史的觀念》 (*The Idea of History*) 時，深為其中許多討論歷史知識的特質、開人眼目的篇章所吸引，像一個事件的內在與外在部分，像歷史知識是一種對過去思想的「追體驗」 (nacherleben)，當時覺得比起那時最為當令的韓培爾 (Carl G. Hempel) 的歷史通則 (covering law model) 更有說服力。

余先生在文化上有許多主張，值得深入探討。在這裡，我只想舉一個例子。前面提到余先生從年輕時代起，對自由、民主的理論便做了很多討論。如果我的了解不錯，在 1950 年代，由於國共政權之更迭，使得究竟是走西方自由之路，或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、強調分配上的平等，是相當熱門的問題。傅斯年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，如果只有自由而沒有平等，那樣的國家他不願意住。如果只有平等而沒有自由，那樣的國家他也不願意住。他心中比較認可的，是像羅斯福「新政」時期那樣兼顧兩者的政治。

如果我的了解沒錯，余先生《自由與平等之間》等論述，便與當時思想界渴望得到解答的想法有關。除了自由與民主的討論之外，我覺得政治哲學家羅爾斯 (John Rawls)，1993 年出版的《政治自由主義》 (*Political Liberalism*) 中提到的「背景文化」是值得注意的。簡單的說，在民主與自由的時代仍需要有一個「背景文化」，否則它們是行

不通的。我覺得余先生從早年在討論自由、民主的時候，便與這個「背景文化」的觀點暗合，所以他在那個時期的許多文章中都提到中國傳統文化。當時他曾經給《自由中國》投過一篇文章，認為提倡自由、民主仍不廢儒家文化。但是，這篇文章被拒絕了。因為當時臺灣知識界的主流派認為，若想推行自由、民主就要以清除傳統文化的阻礙為前提。一直到近年，我覺得余先生更加自覺「背景文化」的重要。他在「余紀忠先生講座」以及唐獎漢學獎的座談中，都強調「人文與民主」，也就是認為豐厚的人文素養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「背景文化」。

最近我才驚覺當年負笈普大，在系辦的走廊巧遇余先生時，余先生正好就是我現在的年齡。那時余先生精神颯爽，名滿天下，剛從耶魯大學的講座教授轉任普林斯頓大學的全大學教授 (University Professor)。沒想到歲月不居，轉眼過了將近三十年了，時光飛逝，不免令人深深感嘆。∞

#### 延伸閱讀

► 〈傑出華人系列—余英時〉 (2008)，這是香港電台 (RTHK) 著名的紀錄 / 訪談系列，本文作者也出現在影片中。在 YouTube 上流傳好幾個版本。

► 余英時主講〈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〉 (2014/9/19)。余英時是唐獎第一屆漢學獎得主，這是他的得獎演講內容。

<http://www.tang-prize.org/Publish.aspx?cnid=250&p=309>

► 余英時主講〈新亞書院與中國人文研究〉 (2014/9/27)，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65 週年講座。余英時受教於錢穆，是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。在演講中，他深談新亞兩位元老錢穆與唐君毅的成就。

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0NU5HbzOtUc>

<sup>1</sup> Dao: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(2007) 6:39-51, Springer.